

由信古到疑古

〔史學講話〕

紀庸

一 所謂「古」

「古」字是由十口兩個簡單的字形（古時叫做文）組織起來的，最早的字書「說文」（東漢時）裏邊講，就是十口相傳的意思。一件事傳下幾代，當然是很古的了。究竟古字最初的意思是否如此，無從考究，不過我們由這個字可以知道一個事實：遠古的事，因為還沒有發明文字，只有一代一代的傳說。

用口來傳話，不用說十代以上，就是同時，也容易錯誤或變質，所以成語有「傳聞失實」一句話。人類全有點好奇，好誇大，這是因為人類頭腦比較複雜，聽話的人想要多知道新奇事物，說話的人爲了迎合別人心理，便不惜天花亂墜，加油加醋。同學們到外面看球賽，回來講述球賽情形，一定把那得分最多的選手形容得像個生龍活虎，使聽者津津有味。看了電影，話劇，乃至街頭巷尾一件特殊的事情也是一樣。這種情形，甚至普及到我們日常的話語，天氣熱，就說「熱死人」，看了兇狠的人和物，就說「嚇殺人」，全是過火的形容詞，可是我們聽熟了，恬不爲怪。現代的，同時的事，經過口傳尚且如此，古代的，距離我們幾千年幾百年的，當然更帶了靠不住的成分。

語言是文字的先聲，我們所看到的最古文字是殷商時代，距離現在不過三千多年，可是我們的傳說古史，往往會追溯到五千年以上。縱有文字的時代往上推到沒有文字時代的歷史，起碼有

一兩千年。這一兩千年的事情，就是用「故老相傳」的方式流傳下來的。等到人類會充分利用文字紀錄語言時，再把他紀下來，那便是史書。

我說「會充分利用文字」，這距離剛會使用文字的時候又有若干年。按照傳下來的最古文字，譬如商代和周初，他們的文法修辭都很簡單，僅僅能够把事實的要點紀下，要他們充分紀錄古代的傳說，還不可能，而且工具也限制了他們。那時候不但沒有紙和筆，就是後來用的竹簡（薄而狹的竹片）和絹帛，恐怕也沒有，他們只能利用一些現成的東西，商代就用龜的甲殼和獸骨，字是用刀子刻上去的。這些東西在河南安陽商代的故都（所謂殷虛，虛就是廢墟）發掘出來很多，我們稱之爲「甲骨文」。周代的文字紀錄，大多數是用銅器，這本不是作爲書籍用的，而是一些紀念品，或是打了勝仗，或是封建諸侯，就鑄了銅器，把這事實簡要的刻在上面，可以傳之久遠，因爲多半放在宗廟裏，（就是天子和諸侯的祖先堂）作爲祭祀時的陳設，所以又叫「禮器」。至於普通紀錄事實的東西，究竟用什麼，還沒有發現，到了周代的中葉，大約就有竹簡了罷？

前面我們已經說過，傳說是越來越變質越紛歧的，到了文字紀錄工具方便的時候，古代傳說也就膨脹得達到相當程度，再經過紀錄的人加上有意的渲染，古代的歷史就花樣百出了，這大約是戰國至漢代的事，距離現在差不多兩千年到兩千五百年。

二 爲什麼信古？

既是古史裏摻入不少不可信的成分，爲什麼還要信呢？這種心理是怎樣造成的呢？

第一，人往往是短視的，越是知識簡陋的人越甚。短視就是不能憑理智判斷是非，而完全信賴了自己感情的好惡。這種情形在現代仍然找得到，我們可以拿沒有開化的野蠻民族，去研究古代沒有進化的人。有名的美國社會科學家莫爾干 (Morgan) 「古代社會」一書，就是他研究美洲土住的印地安人 (Indian) 的結果，由現代印地安人的生活，推知我們古代的祖先許多生活的情況。這部書已成爲研究古代社會的權威。由莫氏的考察，我們知道原始人是沒有固定配偶的，故以母親爲中心，正如我們中國古書裏所說的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」。這時人類的組織，只是一姓，一宗爲本位，慢慢纔擴大到幾個姓和宗組成的族，也有了族的酋長。他們的生產是漁獵和畜牧，常常和別的族打仗，敵人被俘虜了，始而是殺死，後來就作奴隸。從這時起，他們就有了敵我之分，對於自己特別尊敬，也就是對於敵人輕視。不但尊自己，尤其尊重祖先，一方面因爲祖先的傳說逐漸多起來，一方面因爲原始人有着一種「生殖崇拜」，他們對於男女關係和生育現象認爲極其神祕，所以格外把祖宗看重。郭沫若先生說，祖的原始寫法是「且」，在甲骨文裏，是且上象形，就是男性生殖器的形狀，（見「甲骨文研究」釋祖妣）可以證明古代人對於祖先崇拜的由來。現在比較野蠻的民族中，還有崇拜生殖神的現象，甚至有專供此種神的廟宇。祖先在古人心目中既具有這種神祕的力量，當然關於他的傳說就更加離奇，而且深信不疑。

二，後來知識雖然進步了，可是祖先已經成爲偶像，是不容

打倒的。而且他們認爲死去了的祖先，就是天神，會對於他的子孫加以保護和照應，如果作事不好或不敬祖先，也會遭到懲罰。於是祖先就不只是傳宗接代的人，而且是本族的監視與保障的神力，和上帝（天）同在的。所以便興出種種形式來祭祀禱告他，無論作戰，求雨，打獵，問收成，全都向祖先要求成功。爲了這種繁雜的祭典，除去政治酋長以外，又產生一種像僧侶的人物，專負求神問卜之責，他們被稱爲「巫」或「卜」。商代的文字裏這種人已經很多，他們的勢力暗中可以左右政治，因爲如果一件事祖宗或上帝不許可做，就不能作。每件事必須要卜，卜，就好比現在占卦，不過如今占卦是少數愚民的事，古時則是帝王每天必須舉行的。所以古書裏說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，（且）左傳）祀就是敬祖敬神，或就是作戰。事實上作戰也常要得巫卜的許可。巫卜的預示，或預兆，就是祖宗神靈的意思。巫人把龜殼上鑽了洞，用艾絨在裏面炙起來，便有了裂紋，稱爲「兆」，看裂紋的樣子，巫卜們就知道吉凶。商代甲骨文所紀錄的，多半是這些。那時的祭典盛大得很，作爲供品用的犧牲，或是牛羊，或是狗馬，有時竟至是活生生的人！（大約都是外族的俘虜）對於祖先的崇拜到了這個程度也就可以說信賴古代到了極點。

三 信古的心理被利用

從家族進步到國家，這又經過了若干年。中國歷史，據現代人的看法，商代已有了國家的雛形，周代已可算是國家。周代繼承了商代的文化而更加發展，舊歷史裏常常說「周公」這位聖人，制定了一切典章制度，當然這話不可信，因爲現在流傳的「周禮」這部書，證明是假的，可是從前都說這就是周公的「建國大綱」。周公的事，雖然不能完全證實，可是有幾種制度，確是由周代起

而漸漸樹立的，其一，是封建，即將全國土地分為若干單位，分配給貴族和功臣們，讓他們全權管理，但仍然要聽中央政府——天子的號令，他們是以天子的代表而存在的。被封的，叫做諸侯，這是在初中歷史裏就讀過的。其所以要封諸侯，一則因為土地面積大了，天子一個人照料不過來，分給自己一家人大家負責；二則可以借此鎮壓了被征服的敵人。譬如周把商趕到東方，（原來商在河南，周在陝西，那時周佔了河南，商人被迫東移，大約到了今日山東一帶）就在周圍封了好幾個貴族來監視他們，周公封於魯，（山東東南部）康叔封於衛，（河南東北部）召公封於燕，（河北）整個包圍了敵人區域，這幾個諸侯全是和天子血統最近的。這可以說是家庭的擴大，根本是由一個祖先之下分出的枝脈。他們爲了使家庭制度——亦即團結一個祖宗的子孫以形成一個勢力——鞏固，又有一種辦法，就是確立宗法制度。我們今日所見到的古書中宗法制度，（如「禮記」）說得那樣完備，應該是戰國以後的話，不過在這些記載之前，社會上大概已經流行着這種組織了。宗法制度的要點，要把一個祖先的子孫，分別了親疏遠近，各自享各自的權利，各自盡各自的義務。長房長子是正式承繼香燭的人，他應該負起大責任，照料本族各支。可是一個支房，又是他的長子來負本支之責，如此下去，形成一個有系統的血族網，在這網裏的人，大家共同敬一個祖宗，就該互相扶助，互相親愛，如有外來勢力，共同應付。這便是我們中國社會的基本細胞，也是國家形成的重要元素，說起其來源，是由於祖先崇拜，也就是由於我們肯於信古。

時代愈久，祖宗的偶像化愈甚，也就更不容我們懷疑。這種心理的演變，就成爲凡是古代的東西都好，因爲古代就是我們祖宗的時代。祖宗的大帽子，誰也不能反抗，反抗就是不孝，不孝

此什麼罪名都大。

四 作偽者——信古心理更進一步的利用

美國作家辛克萊 (Sinclair) 在他的文學批評「拜金藝術」裏有一句話，「一切藝術都是宣傳」，「All arts is propaganda」有許多人罵這句話過火，我卻覺得很有道理。不信請看，在今日世界上，哪一種作品不代表一種思想，一種傾向，或者反對某種思想傾向？中國唐代的韓愈所說「文以載道」，正有相同的意思。從前政治家還愚諱宣傳，說「爲政不在多言」，如今政府裏公然有宣傳的機關，經常幹宣傳工作，一切藝術部門——小說，詩歌，圖畫，劇本……無不被採用爲宣傳工具，辛克萊的話，好像成了他們的宗旨了。

現代如此，古人也如此，不過方式不甚相同而已。古人當然沒有發傳單貼標語這一套，可是人類文化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，主張，都希望拿來實行，於是就有了「自我宣傳」，在自我宣傳時，是要利用到一般人信古這個心理弱點的。

歷史中所記的周代有八百多年，可是到了一半的當兒，周天子的勢力已經不能控制諸侯，那是因爲生產方法有了長足的進步，農業發達，大的諸侯國力雄厚，就起來吞併或是控制小的。他們並不是完全忘了祖先，而是幾百年之後，感情不免冷了，而況諸侯之中，也不完全是天子同姓的貴族，有許多是異姓功臣之後。在這裏，我們必須明白，所謂異姓功臣，其實起初就是奴隸，因爲他作奴隸忠實而又比較聰明，就攀到諸侯的地位，好像許多大家巨族的管家一樣。在每個諸侯的下面，又有卿，大夫，士等階級，他們與諸侯的關係，也彷彿諸侯與天子，——是給諸

候全權管理事務的，一層層下去，大夫伺候卿，士就伺候大夫。貴族們是這樣的排列着一個等次，居於最下面的則是農民，即所謂「庶民」。他們是賣力氣給貴族生產的，絕對沒有知識。

可是翻身的時候來了，天子腐化了，被貴族控制，貴族們本身也逐漸腐化，而政權逐步下移，終於小百姓也挺起腰來，他們生產方法進步了，可以有些富裕，便也學一點知識，漸漸成爲知識分子，想要在政治舞臺上出出風頭。登時，這個社會就點綴得空前的熱鬧。這就是周代的最後二三百年，春秋和戰國時期，尤其是戰國，許多由平民轉化的思想家全出現了。

爲了把他們的主張說得有根據，至少可以不使人發生反感，他們就描準了人們崇拜祖先信仰古代的心理，硬說自己的辦法，理論就是古人的。譬如孔子和孟子這一派——許多人說他們代表着沒落的貴族——就擡出堯舜禪讓的事來，孔子以前，堯舜的事還不大流行，就是曾經說到古代的帝王，也是一套傳說的神話，絕對不會有那麼高尚完備的人格，可以說，孔子以前傳說的古代帝王，人類的遠祖，全是神化了的，（如大禹的平治水患，完全把他神化了。）到孔子以後纔開始人化，而這種人化的觀念，都是有作用的搗鬼造謠。反正古代沒有正確的歷史，隨便怎麼說全可以，所以我們就常常發現一個故事的不同說法。由這些矛盾裏便可以看出造謠的痕迹。仍以堯舜的事爲例，孔子對於他們只有虛無縹緲的頌揚，（論語堯曰篇有祀禪讓的話，但不可信，這篇是漢人作品。）孟子就給他編了許多故事，堯的臣怎樣，舜的父親怎樣，弟弟怎樣，堯死了以後四岳（人民代表）怎麼舉舜，舜以後又怎樣舉禹。……夾在孔孟中間的墨子，則說堯舜的「禪讓」純粹是當局爲國擇賢，不是人民所舉的，而且不曾說到舜把帝位讓禹的事。孔子是尊天敬君，要維持舊秩序的，就說「唯天爲

大，唯堯則之」；墨子是主張誰有本領誰就來作領袖的，（所謂尚賢）就說堯把舜提拔出來作首領，因爲他「賢」。孟子是主張民貴君輕的，合理的帝王應該以人民的意見爲意見，就說舜和禹全是人民所擁戴，堯雖有兒子，也不能不顧及到人民的意見。……諸如此類，每一派全製造了自己的偶像，竭力鼓吹，與其說是講古人，不如說是講自己。這種把古代歷史和政治拉在一起的風氣，到漢朝還有，所以漢朝也是一個製造古代歷史的時代。然而因爲當時人很少歷史觀念，只有盲目的信古心理，所以就將這些當作真實。等到他們的著述流行得久了，而且像孔孟的書，經過漢以後政治上的提倡，不但是史料，而且成爲「經」書，經書是天經地義，不能變更的，本來他們所製造的都是偶像，現在連他們本身也成了偶像，就更加沒有疑慮的餘地。古人對於歷史本不負責，他們的話，不過信口開河，隨便拉古人來作今人的榜樣，好的便是「勸」，壞的便是「懲」，——即如相傳孔子作的魯史春秋，也是充滿了主觀的「褒」「貶」，認爲對的，是一種記法，不對的，又是一種記法。假使這話可靠，在今日的史學眼光看，這種歷史就太不忠實，因爲完全是一個人的看法呀！不料，這種不負責的，不忠實的古代紀錄，憑藉中國傳統的信古觀念，居然成了最可靠的歷史，差不多延長了二千多年，沒人敢來動搖他。

五 人類的醒覺——從信古到疑古

大多數人都在古代的離奇傳說裏，或一部分思想家製造的謠言裏迷惑的時候，居然也有頭腦清楚一點的，感覺這些說法有漏洞，這些人真有如黑暗中的幾點星星之火，其光明愈加可貴，而且這幾點星火，終於大放光燄，照澈了全部古代歷史，使我們多少接近了一些古代的真象。

戰國本是亂造歷史的時代，可是就在當時，便有人表示不相信，如荀子就不信堯舜禪讓的說法，認為是「虛言」；即孟子自己也說過，「盡信書則不如無書」，勸人不要完全迷信書中記載，這就分明聲明了他自己的話不是完全可靠。更早些，孔子的大弟子子貢說：「村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村本是商代的亡國之君，說他不善的，當然是周代的征服者，這裏面政治作用很濃厚，可是直到今日，我們一說暴君，還用桀紂作例子呢。依子貢的話，村何嘗那樣壞？可是他的話的用意不是辨別歷史，依舊是用來勸人，主要在「君子勿居下流」一句話。此外，韓非子（戰國末期）是攻擊信古最厲害的，他主張一切辦法，思想，全該隨着時代走，古時總沒有後來進步。因此，他也就對於孔孟和墨子的製造古代偶像大加反對，關於堯舜的事，他曾說過，儒家所講的堯舜和墨子所講的不一樣，堯舜是不能再生了，誰能斷定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！（顯學篇）這種敏銳的看法，實在了不起。

西漢有位劉安，作了「淮南子」一書，常有分析人類信古心理的話，很是透澈。（修務訓，汜論訓，俶真訓等篇）

東漢有位王充，作了八十五篇「論衡」，對於世俗的傳說，加以不客氣的攻擊。可以說是疑古的一尊大砲。他說經書史書裏有許多話是誇大的，傳訛的，（書虛，語增，藝增等篇）世俗的迷信，也不合理，他個人就不信鬼怪。（論死篇，訂鬼篇）唐宋以來，隨着思想的進展，疑古的人越多，宋代本來都是道學家，好像應該最崇拜古人，其實並不。他們倒很有膽量反對古人的錯誤，而要求「聖人」的真象，朱熹就是一個。他覺得經書中所附的漢人注解，全是附會的，譬如詩經裏許多民歌全是戀愛的詩，而漢人都當它是讚美政治或諷刺政府的，朱熹就把他們推翻了，

而痛痛快快的說是「淫奔」之詩，淫奔兩個字，雖不是好話，但其意義，就是男女相愛。他曾給許多種古書從新作了注解，完全按他的主張，不以古人為標準，雖則有時太主觀，可是有膽量。清朝是中國學術的實證主義時代，若干學者都知道運用科學方法來訂正傳統的錯誤，考出原始的真相。只是，可惜他們究竟打不破崇拜古人的迷信心，他們所反對的是宋代理學家所講的空話，他們崇拜的是漢代人，以為漢代人離孔子不遠，說法一定不會錯，故他們的學問，又稱為「漢學」。卻不知漢人一樣荒唐，而且頂頂迷信，常常講些不倫不類的胡話。他們等於沒有跳出瞞書的手心。

敢於對漢人開大砲的，是戊戌政變主張維新政治的主角康有為。我們在歷史裏知道他是一位初期政治改革家，其實他的改革，不止政治，對於學術的貢獻更大。不過，他在學術上的主張，與在政治上的主張是相關聯的，也可以說，學術的主張，就是他的革命哲學，是政治行為的原動力。

他寫了兩部不朽的著述，「孔子改制考」，「新學偽經考」。關於他們的內容，我不能在此詳細介紹，但其大旨，可以談談。他首先提出上古的歷史是無憑無據的，我們今日所看到的，大致全是戰國至漢代的學者們所編造。為什麼要編這些「偽史」呢？主要是為了政治作用，像前面我所提出各家對於堯舜不同的記載，就是他的意見。他認為那時孔子要改革政治，就製造了堯舜這些偶像以鎮壓一般人的反對。不但孔子，和孔子同時及以後的思想家，沒一個不用這種手法。這是孔子改制考的大意，這種改制，（改革政治制度）叫做「託古改制」。至於第二部書，是爲了打倒流傳了快到兩千年的「左傳」和「周禮」，他證明這是正莽時劉歆搞的，王莽篡位，國號叫「新」，故稱之爲「新學」，

以表示他够不上「漢學」，有看不起的意思。劉歆爲什麼要作這種事，說來話長，主要也還是爲自己可以升官發財，因爲在這些書裏給王莽立下篡位的根據。

康有爲是想輔佐當時的光緒皇帝打倒頑固的西太后的，但西太后周圍，自有一些腐敗守舊的親王大臣給她保鏢，他們互相利用，眼看國家就要垮台。康氏這些書，當然有點針對了頑固派說話，頑固派最大的偶象是孔夫子，孔夫子是要「率由舊章」「述而不作」的，而且最忌諱「用夷變夏」，（以外國的方法改變中國方法）守舊派拿這個作對付維新派的擋箭牌，經過康氏這一來，孔子不但不是頑固分子，反而成了革新祖師，就使得他們沒話可說。——因此，後來總有人開康氏玩笑，呼他爲康聖人，言其以孔子自居。

康氏的君主立憲主張，「保皇黨」組織，不久就被民族革命，民主政權的浪潮打下去。他以一個極維新的人，後來竟變成守舊分子，成爲革命對象了，時代是如何不留情！但是他的政治思想雖然不行，他的學術主張卻掀起了歷史研究的新潮。

自民國成立，時代畫了一個新界限。以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爲中心，思想界又形成一個嶄新的壁壘，始而舊的還在掙扎，不久，就和太陽下的冰雪一般，完全消融。五四帶給新青年的思想，主要是科學精神和民主政治，即所謂賽先生（Science）和德先生（Democracy）。這兩種精神反覆激蕩，捲有今日的思想界和政治的惡鬥。別的不談，我們只談史學。

第一位受了康氏影響，又受了胡適之先生所帶來的「實證主義」浸染，起而對於古史表示懷疑的是顧頤剛先生。我們看看七冊九大本的「古史辨」，幾乎多半是他領導的成績。時間很巧，恰好五四後的第一年，民國九年，是他疑古文字最早的編年，

（見「古史辨」第一冊）但到民國十二年在「讀書雜誌」發表「與錢玄同討論古史書」，纔正式有系統的提出他懷疑古史的意見。他最初懷疑的是在傳說中神通廣大的夏禹，認爲這是一個神，而不是人。豈時這說法就引起熱烈的辯論。由禹而上溯堯舜等古代系統。顧氏的論斷到了十八九年以後漸漸成爲一確立的學說，他的「三皇考」，「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」，及「戰國秦漢人的造偽與辨偽」，都是非常有意義的，打破了若干攪不清的迷惘和混沌，使我們對於荒遠的古代，有了鮮明的視野，可以說，通往古史這條路，好像長滿了荆棘，沒法子涉足，顧氏的功勞是清除了這些障礙，使我們認清路數。他的基本主張，是「層累造成古史說」，古代傳說是頂簡單的，傳得久了，人們有意無意加以修飾，於是越弄越複雜。不但古史這樣，流行於現在的民間故事，民歌也這樣，譬如民歌裏的孟姜女哭長城，從古至今，就有許多變化，而各省的哭長城又各不相同，不過他的母題，總離不開一個中心罷了。我們看舊小說，亦復如是。「水滸傳」的脚本是南宋時一個叫做「宣和遺事」的書，內容簡單得很，人物也沒有那麼複雜，可是經過說書人及編者一加再加，如今竟成了洋洋大觀的一百二十回！「水滸傳」的歷史不過五六百年，而古史則有二千年以上的增改，當然會使我們更感到迷惑了。

那麼，也可以說顧氏的工作，多半是偏於破壞的，要想建設，當然先得破壞。現在我們再看建設一面的成績。

乾脆說，古代書籍的記載，若沒有真的「物證」，簡直就得全部懷疑。幸而古代的物證竟陸續的出現了，例如前而我所舉過的股代甲骨文和殷周以來的青銅器。——甲骨文的數目沒有確實統計，大約總有幾萬片；銅器的數量超過五千——我們可以從裏邊看，到底古書的記載有多少是靠得住的。（下接五八面）

可分株了。

蘭性喜陰濕，最怕炎烈日；耐寒力又弱，受不了霜雪的摧殘，所以有人將焚蘭法，編成四句口訣，叫做：「春不出（勿放露天），夏不日，秋不乾（多澆水施肥），冬不濕（收藏處度，勿多澆水）。」

自從屈原在「離騷」中，將蘭反復歌詠後，文人學士，常把它作為詩詞的題材，像：漢張華：「蘭蕙綠清渠，繁華蔭綠渚。」魏文帝：「秋蘭被幽壑。」晉阮嗣宗：「清露被蘭皋。」唐李白：「寄君青蘭花，蕙好庶不絕。」但他們詩中的蘭，都像禪關。宋楊誠齋詠蘭詩：「健碧綴繁葉，斑紅淺淺芳，幽香空自秘，風骨祕幽關。」以及宋劉後村詠蘭詩：「兩盆去歲共移來，一置雕欄一委苔，我拙扶持令葉瘦，君能調護遣花開，綠人挑

（上接十五頁）

第一位作這工作的是王國維先生，他用甲骨文裏所記的殷代帝王名號和漢代司馬遷所作的史記對照，發現史記的紀載十之八九可信，有根據，於是，商代的史實就有着落了。但夏以前的古事，還找不出多少影子。王先生作學問雖然頭腦很新，但他的政治思想甚舊的，他仍然自居為清朝的人，不幸這種思想與現實的矛盾逼得他自殺了。

他的方法，也啓示了不少的學者。最有成績而給中國古史建設起新面目的是郭沫若先生。我們都知道郭先生是有名的新文學家；詩人，劇作家，兼小說家；卻往往不曉得他在古史方面的偉大成就。他的天才真是了不起！因為他了解西洋新興的社會科學和唯物史觀方法，自從民國十五年他和政府政治意見不合避往日本之後，就專心研究古史。他首先用莫爾干「古代社會」和德國

蓋尋千匝，稚子澆泉走幾迴，亦欲效擊柝小圃，地荒終恐栽我培。」詠的還是蘭蘭。宋朱熹也有詠蘭詩。他說：「今花得古名，隨旋香更好，適意欲忘言，應翻詎能老。」可見種蘭花的風習，到宋朝纔盛。又因為香氣和那種叫做蘭的香草相像，就把牠叫做蘭。年深月久，反客為主，竟把這個名稱獨占了。像這樣「今花得古名」的例子很多，大麗花有人叫洋牡丹，蕃茄有人叫西紅柿，蠟梅不是梅，胡桃不像桃，真是不勝枚舉。

我國有些文人，喜歡撒幾筆水墨蘭花來怡情養性，消磨時間。畫的蘭花，多是只畫花，莖，葉，而不畫根的。後來，有一位徐枋先生，在明朝亡後，專畫露根的蘭花，好像掛在空中一般。有人問他，他說：「何處可種此花？」因為天下已經沒有一片乾淨土了。此後互相仿效，便成一格。

恩格斯(Engels)馬克思的好友)「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」各書中的說法，來估量上古的中國社會，果然給他說出了許多極新極透澈的見解。他對古代文字的認識和解說也有極驚人的成績，最先發表了「甲骨文研究」及「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」，又根據了這些材料寫成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」，這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用新觀點寫成的古代史。他的議論也許還有可商量之處，但自從這種方法一出現，立即引起史學界莫大的興趣，接踵而起的同類著述太多了，恕我不一一詳述。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」是一九二八年初版的，到今年整整二十年，倒是一件頗可紀念的事。

自從「古史辨」出版，我們的歷史再也不講什麼盤古氏開天闢地，天皇地皇人皇人頭蛇身的話了；自從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」出版，我們又知道接朝代分段的歷史不對，應該按照社會進化的情形分段，這都可以說是歷史界的里程碑。